

## 讨论文

金贤善（明知大学）

2019年12月3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越过亚洲扩散至欧洲和南美洲，全世界进入紧急状态。截至1年后的现在（2020年12月31日），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8200万，死亡人数超过180万。对于当今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和防疫这一现实问题上，三位老师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关注传染病、防疫、环境和卫生等主题的讨论者，通过三位老师的研究，我个人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

首先，我从朴汉珉老师和市川老师的研究中发现，在开港场检疫方面，朝日两国都因主导权问题而发生摩擦，这部分非常有趣。两位老师的研究再次确认了这样一个教训：主导传染病防疫的国家，主导近代文明以及为克服传染病需要国际联合和合作。

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下，美国、法国、英国等所谓的“强大国家”出现了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强大国家”的应对能力比想象中更加无能，对疫情完全束手无策。余新忠老师的“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让我有了结合当下疫情，重新思考近代卫生防疫意义的机会。此外，正如老师所说，这对于纠正当前和未来中国卫生建设的弊病有很大的教益。说到与余新忠老师的缘分，我还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时，当得知老师要来我校进行讲座的消息后，激动得没怎么睡就去听了老师的讲座。由于性格胆小，所以没能向老师要求合照和索要签名，今天能见到老师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个人也有几个问题想在此请教。

1. 在4p中提到：“不能只着眼于近代卫生防疫的明显的近代性和外来性，而忽视传统要素和力量。可以确认的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观念或行为在清潮末叶之前的中国社会中是存在的。但是，由于社会力量主导了这一点，其表达方式呈现出个别、自主和缺乏公权力介入的特征。”但是老师在现有的研究中曾提到，当社会力量开展医药局事业时，与国家及官府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然而我们于此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非但没有出现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的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却在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中出现更多、更为广泛的合作。《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应对》，p. 55）。那么，在与官府合作的过程中，是否有公共权力介入或行使了与之相应的权力，对此我怀有疑问。

2. 在8p中提到：“（近代公共卫生）的近代动力依然是中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巨大自生力和自强精神，以及代代延续的社会性灾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轻易忽视传统在中国应对传染病方面的意义”。传统时代的东亚，当发生各种灾害时，执政者将其视为上天对实情的

谴责，从这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性灾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中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巨大自生力和自强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少有些难以理解，这让人怀疑是不是过度解读了这一点。

3. 在 5p 中提到：“在以卫生角度实现的近代化过程中，许多的‘进步’是付出了牺牲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作为代价，这是常有的事情”。对此，很想知道是否存在描述弱势群体受害和对社会不满的文集或记录。正如老师所说，不能说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是正确的。但纵观韩国目前的状况，大多数人为了形成公共利益和健康的共同体，甘愿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和不便。相反，在西欧，由于将个人的“自由”作为绝对价值，因此没有达成旨在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协议，有认为这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原因之一。清代发生瘟疫时，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国家的利益，我想知道当时中国民间有没有形成健全共同体的社会协议？（社会力量的领导者-乡贤-一般都深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他们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多少也会顾及到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p. 288）

传染病不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共同克服的课题。将东亚这一区域设定为传染病相关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通过今天老师们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期待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和今后传染病流行的启示。